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最后的儒家

——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美】艾恺恺恺著
王宗昱
恺恺 冀建中 恺恺译

本书特约责任编委恺杨润时
执行主编　刘　东
总 策 划　周文彬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摇图书在版编目（悄摇）数据

摇最后的儒家 :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辕(美) 艾恺 (粤遥遥遥遥援著 ;王宗昱,冀建中译援—圆版援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圆猿猿缘
摇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辕刘东主编)
摇陨泽晕苑—圆源—园员猿缘—远

摇Ⅰ援最…摇Ⅱ援①艾…②王…③冀…摇Ⅲ援梁漱溟 (员愁愁缘—员怨愿园 —传记摇Ⅳ援…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悄摇数据核字 (圆猿猿缘 第 园缘员源号

摇摇摇书摇摇名摇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著　　者摇(美) 艾摇恺
译摇摇者摇王宗昱摇冀建中
责任编辑摇孙摇立
责任监制摇蒋子平
出版发行摇江苏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 :园猿园园圆缘
地摇摇址摇南京中央路 员缘号
网摇摇址摇澡藻责:辕…
经摇摇销摇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摇摇排摇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摇江苏兴化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摇摇本摇怨园…员猿缘毫米摇员猿
印摇摇张摇员…
字摇摇数摇猿园千字
版摇摇次摇圆猿猿缘年 愿月第 圆版第 员次印刷
标准书号摇陨杂月晕苑—圆源—园员猿缘—远缘猿· 苑元
定摇摇价摇圆…员元
摇摇摇摇摇摇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 1

导　论 / 1

第一章　父与子 / 11

第二章　精神变态、自杀、成圣 / 24

第三章　北京大学的孔夫子和文化 / 48

第四章　中西文化（一） / 57

第五章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社会反应 / 89

第六章　梁漱溟在探索一个纲领，[illegible] / 96

第七章　广东与河南：乡村重建的开端，[illegible] / 110

第八章　中西文化（二） / 127

第九章　乡村重建：儒家的现代化 / 139

第十章　南京[illegible]年之乡村建设：一个政治和社会的分析 / 164

第十一章　山东的乡村建设 / 173

第十二章　抗战时期和战后：政治和论战 / 201

第十三章　回到北京 / 229

第十四章　[illegible]年跋 / 240

参考书目 / 251

中文版序言

王宗昱先生研究梁漱溟先生的哲学思想有年,曾主持了《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的编辑工作,现在又与冀建中女士合作译出了拙著《最后的儒家》,并来信嘱我作序。

在人们的脑海里,梁漱溟有四种形象:哲学思想家、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政治上的中间派以及 20 世纪 30 年代知名的受害者。

不过还有一点应予补充,他也曾就此提醒过我们。他自谦地说:"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这是他的独到之处。他不同于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从不"坐而论道";他总是思考着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此外,他自己还强调过,也无人可以否认,他是表里如一的人,其思想和道德是一致的。

当只有二十几岁的梁漱溟成名时,正值具有重大意义的"五四"时期。对于这个时期,各国史学界无例外地给予重视。然而梁漱溟虽是该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却例外地没有像别人那样受到注意。不单在中国是这样,美国亦然。

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史起步较晚,直至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方面的著作尚付阙如。华裔学者周策纵 20 世纪 50 年代写了 我的老师胡适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和《五四运动》),才提到梁漱溟,但也只有一页半,仅限于介绍梁漱溟早年作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迄今为止,拙作是惟一的梁漱溟评传。稍晚的梁启超、胡适、李大钊、鲁迅等,都有人作了传记,甚至不止一种。美国人认为胡适是"五四"时期的主要思想家,这和胡适与外国联系不无相关。外国人容易知道他、理解他。胡适、李大钊和梁漱溟是同时代的人,而且李氏和梁漱溟还是好友。美国人在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时,首先注意到了李大钊。这当然不难理解,人们自然会注意站在左右两翼突出位置的历史人物。

梁氏终生被看作近代中国的保守派，或者“文化守成主义派”，且又不属保守派中的最杰出者。说到“五四”时期，人们可能提出梁启超、张君劢或某个人为保守派的主要代表。梁漱溟的思想在当时（“五四”）已被评定为保守，赞同他意见的人寥寥无几，多数人则不免先入为主地予以忽略。

作为 [illegible] 年代政治中间派的关键人物，梁漱溟往往鲜为人知。张君劢常被看作起主要作用的人物。张氏研究西方政治，又于 [illegible] 年写了 [illegible]（《在中国的第三势力》）的英文专著，并领导着一个中间派的民社党，因而大家知道他的作用。梁氏说过，他的参预政治，完全是为了调解国共冲突，一当国共冲突已无可避免，便决意退出现实政治。这和许多人的涉足政治很不一样。

在 [illegible] 年代受到粗暴批判的人相当多，不过情形并不一样。例如胡适，对他的批判甚猛，但他却身居海外，不受触动。梁漱溟则不然了，只因他具有罕见的定力，抓住一次次政治运动的间隙，才完成他的《人心与人生》及其他相关的哲学著作。他后半生的著作，由于政治上的禁忌，几乎是在他辞世前不久才得以出版。这既可庆幸又可惋惜。

我研究梁漱溟先生既与偶然机遇有关，又和个人性格有关，也和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逐步深化的总体趋势分不开。费正清先生在美国是研究中国的泰斗，他对中国的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和历史学进入中国并影响到中国开始，渐进深层，直至研究中国本身。进入五六十年代，受他的影响，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的后学，大体上也是这样一个路数。

[illegible] 年代初，中国集中批判杨献珍和周谷城。颇为偶然地，这却成了我研究梁漱溟的机缘。在阅读那些批判文章时，我第一次看到梁漱溟这个名字。当时台湾不允许公开出版梁漱溟等身居大陆的学者的著作，而在台港探访梁漱溟早年的学生时，他们也不知道老师的现状。我是在美国和台港搜集梁漱溟的资料的，可见封锁还是很有效。

在美国的图书馆中虽然有关于梁漱溟的资料和他的一些著作，但学界对他实在很陌生。只是在《最后的儒家》出版以后，注意他的人才渐渐多起来。例如费正清在第三次再版《美国与中国》（[illegible]）时，便加进了有关梁的述评。

我曾于 [illegible] 年首次访问中国大陆，那时正着手撰写《最后的儒家》。一到北京，我就多方打听梁先生，渴望见到他。但是每一个被问到的人都难以回答。[illegible] 年夏天，我终于如愿见到梁先生，使我惊喜的是，他几乎与我想像中的那个人相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梁漱溟的表里如一，读其书如见其人。只是到了这一天，我才确信自己成功了：我的书抓住了梁漱溟思想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要义,反映了他的人品。

在约半个月的访谈中,我发现在拙著中有少许事实出入,这在第二版中都得到了纠正。

此后我多次访华,和梁先生又长谈过一次。不过,我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在山东邹平作长达数月的实地访察,了解当年在这里实验乡建理论的经过和成效。

梁先生过世后,我觉得,我对他的评价应作一些改动。现在看来,我对他所提出的世界文化三个路向和乡村建设理论的意义评价偏低。通常,一件事做成了,人们会说那是对的;一件事没有做成,人们就说那是错的。但是并非任何事都宜于根据我们眼见的成败去认识和估量。多次去邹平后,我觉得,本来是他对了。他提出的确实是建设中国的长期方案。

我愿借作序的机会解释一下——为什么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事,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

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

艾恺

导　论

“我看你满身臭气!”毛主席突然夺去发言者的麦克风,对他发出一连串声色俱厉的痛骂①。瓮声回响的北京怀仁堂陷入了一片紧张沉寂的气氛中。这是1953年9月的一个下午,聚集在怀仁堂的几百人正惊愕地盯着讲台,在座的人几乎从未见过主席如此放纵地发怒。毛泽东对这位身材弱小、衣着旧式长衫的人出言不逊,并且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如此空前的愤怒,其目的何在②?毛泽东指着这位戴眼镜的矮个子的面孔继续说道:

>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中国的海伦——艾恺注)还美。③

甚至在25年后官方出版的《圣经》似的《选集》中,虽然作了一些删节和文辞上的润饰,但毛泽东对梁漱溟的评论的后半部分却表现出更为激烈的训斥。梁漱溟提出的任何问题都只能成为那些新奇讽刺的借口。

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

---

① 这次事件发生在拥有63名成员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也列席了这次会议。本书的描写主要取材于〔424f〕和〔194〕(pp. 434—436)。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是经过剪辑的,并且加以说明是“主要部分”。公诸于世的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在此次会议之前的两个发言的合并。这篇谈话极不连贯且有重复之处。唯一一篇由目击者作的报道(〔194〕,pp. 434—436)更增强了这种嫌疑。并且,《毛泽东选集》注明的也是一个连续的日期(9月16日至18日),这种处理通常是说明一篇谈话不是在一天里作的。

② 据说,毛泽东有时也在党内会议上发脾气;但从未听说过他在这种公开场合也勃然大怒,出言不逊。由此看来,他对梁漱溟的这种攻击是罕见的了。

③ 〔424f〕,pp. 107—108。(注释标号书目详见本书第357—393页“参考书目”。中译者注)

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①

毛泽东继续骂道:"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

显然,正是由于梁漱溟先发表了一次演讲才招来了毛泽东的谩骂。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他也曾大胆地攻击过政府采取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决定。因为这样就把最沉重的负担压在农民身上,从而使城市工人事实上成为一个特权阶级。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周恩来当即对梁漱溟的这次演讲作了强有力的回击,而毛泽东则是喃喃自语并且看上去很恼怒。由于意识到自己已引起了国家最有权力的人的愤怒,梁漱溟要求允许他再作一次发言。

也许最好是把梁漱溟先前反对政府的评论理解为古老传统中的清流之勇。梁漱溟同"皇帝"的争辩完全是出于为朝廷考虑。那天,可能历史学家吴晗也在场。他很可能从这一情景中获得了创作著名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灵感。这出道德剧的主人公海瑞也是农民在朝廷上的代言人。像梁漱溟一样,海瑞"过着一种朴素的生活,是一个正直的人,并且坚持原则……从不妥协。他既不为暴力威胁所屈服,也不为失败所动摇。"②善哉!梁漱溟既然扮演了一个孤独而不畏缩的农民代理人的角色,表现了道义上的英雄主义,并且由此而声名大噪,那么他为什么还企图再讲一次呢?

梁漱溟刚一开口,毛泽东就打断了他的第二次发言。但梁漱溟的第一句话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我再一次发言,是想考验一下自己。"③这是他一生经历过的这种考验的顶点,并且也许是儒家传统最后一次有意识的公开表现。因为梁漱溟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儒家传统主义者,而这一姿态则是儒家学说的尾声。梁漱溟同这个世纪最重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鲜为人知的对抗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居高临下的,是中国未来的化身;而这个儒者则是微不足道的,是历史的幽灵。但是,那天两人的举止至今仍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毛泽东对那种不雨之雷的传统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为什么梁漱溟如此强迫自己去坚持他那无望的主义?

猿

① 〔424f〕,p. 108。
② 吴晗:《海瑞罢官》,第 5 页,引自〔458〕,p. 30。
③ 〔194〕,p. 435。

对梁漱溟性格和经历的几点评价

梁漱溟对自我克制和人格完整的不可遏止的关心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他的一生是为了实践他感受到的道德使命不断斗争的一生。人生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它要时刻同道德懈怠的危险不断斗争。这种道德的强制力使他形成了非常严肃的个性。他很少笑,甚至很少微笑,也从不开玩笑①。但他对人并不冷淡。众所周知,作为一个贤人,他对人经常躬着身躯,像个大写的 S。1956 年,一位共产党的批评家曾这样评论梁漱溟:他"常以'天生德于予'的圣人自居,这不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吗?"②

自然,有人会感到这种伪善是俗不可耐的。然而,孔孟一类圣人不是时时在宣扬那种似乎是伪装的神圣和不懈吗?没有人否认梁漱溟是属于一种非常特殊类型的人。大大的光头,像钢一样深邃宁静的眼睛,倔强不屈的嘴唇,低沉但是坚定的声音,所有这一切塑造出了一个安静的、沉着有力的形象。一些钦佩他的人回忆道:他那由于沉静而发出圣洁光辉的风采使人感到仿佛置身于"一尊菩萨像"前。另一个人写道,梁漱溟"是那样地令人敬畏,以至他的学生在他面前难以顺畅地说话。"③

关于梁漱溟的经历和成就的评价是多种多样并且相互矛盾的。他的一生漫长而且复杂;他的一生是曲折的,几乎经历了 20 世纪中国所有的主要事件和运动。他的事业和著作几乎触及了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所有的重大事件。与胡适、吴稚晖这些"五四"时代大多数反传统观念的同代人相比,他是与西方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中国唯灵论的笨拙的保护人,是中国的泰戈尔。他在 30 年代乡建运动中的一些受过外国教育的同事曾傲慢地认为:他具有献身精神,但却是"非科学的"。他那个时代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他和他的纲领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毫不留情地到来之际,农民封建氏族社会在观念上的最后挣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他被描绘为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妄

---

① 我对梁漱溟外貌衣着的了解是根据他的照片以及他的朋友的亲口介绍。至于对他性格人品的了解,有一些也是得自与他的故交的广泛的谈话。

② 〔101〕,p.36。作者在说这些话时,很可能也是以梁漱溟和毛泽东的争吵为背景的,因为他所引用的孔子这段脍炙人口的话(见《论语》Ⅶ:22)和这位大师的一段广为流传的故事有关。当孔子在大树下教导他的弟子时,遭到官吏桓魋的密使的追击。来者将大树拔起,欲杀孔子。弟子们都催促孔子逃命。孔子却很坦然,他坚信自己的圣贤身份和肩负的天赐使命。他从容地用上面这些话安慰学生。这段话的后半部是:"桓魋其如予何?"

③ 〔613〕;〔311〕。

图通过反对工业化而保持中国的软弱，并且同西方帝国主义有着密切联系。在台湾，他既在教科书中被引用，又被作为一个受共产主义欺骗的人而受到谴责①。

梁漱溟和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者

在所有的评价中，梁漱溟都被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或“传统主义者”，其理由是各种各样的。从他洋溢着热情的儒家学说到他那甚至在酷暑里也穿着的学者长衫，我们都可以找到上述称号的根据。但概括说来，梁漱溟主要地是被看作一个“文化上的守成主义者”。② 梁漱溟的思想和行动初看去像是众人熟知的张之洞的体用二分法，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君主制的最后年代里，理论上的体用之分为中国谨慎的改良主义者们的守成主义现代化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公式。他们既能维护他们对中国文化精华（体）的信奉，又能问心无愧地为国家“富强”去照搬西方的工厂和武器。关于“中体”本质的早期资料是含混的，往往是提出一些道德哲学和社会习俗的根本原则。在张之洞的晚年，许多事件迫使他感到要维持“体”就必须采取更具体的办法，他提议促进传统文学的研究。他指出：无论怎样看待体的最终本质，它似乎都同经学和史学分不开。

同时，作为张之洞政治和观念的对立面的一些反满革命家也开始使用相同的基本概念——“国粹”——以为其目的服务。他们采用了日本“国粹”这一新词来代替“体”。甚至张之洞本人在提出“中国的精华”的总概念时也偶尔用到“国粹”一词。由章太炎、刘师培和黄节这类人领导的国粹团体一直坚持到“五四”时期为吴宓、梅光迪的“学衡”团体所取代。在“学衡”派这些人手中，中国的精华被看作是另一种经典的“摇篮”文化，它等同于（但不一定优越于）西方的古典文化。这种国粹观的谱系可以一直延续到 30 年代戴季陶、陈立夫的作用更大并且更政治化的国民党的新传统主义，甚至延续到

① 其例请见〔309b〕；〔580〕。关于他的同事对他的看法，取材于〔612〕；〔615〕；〔618〕；〔629〕。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有：〔597〕，pp. 1—106；〔144〕；〔523〕；〔455〕。台湾和大陆最近的评论有：〔409〕；〔101〕；〔532〕。由于梁漱溟在抗战前、抗战期间以及此后的政治活动，台湾和国民党有关的各方面人士在谈话时都把他称为“同路人”。除了 1971 年至 1973 年这段时间以外，梁漱溟的著作在台湾是一直被允许重版的。

② 艾恺主张把“conservitism”译为“守成主义”，而不主张用“保守主义”一词。关于他对此问题的论述，请见他的《文化守成主义论》一书。我们只在导论的一些论述中把它译为“守成主义”。中译者注。

了台湾最近的文化复兴运动。

国粹派在它的各种再现中都是致力于中国“精神”的保持。这些信徒们相信这种精神就蕴藏在文学遗产中。因此,他们的具体行动是民族精华的表现,而这种民族精华则集中在经学、史学和纯文学当中。他们也常常把自己的努力和欧洲文艺复兴时西方古典学术研究的复苏加以比较。和张之洞一样,他们欢迎那些作为保持中国民族精神的工具的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的“模式”。梁漱溟也投入了这一事业:在接受西方政治技术模式(尽管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的同时,维护中国文化的精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儒家的道德价值)。他也试图造就一个真正的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

在这股思潮的“五四”时期以前,自古已有的今古文经学派之间的斗争又重新展开了。这次争论的不再是作为宗教的儒学的建立问题了。历史上最后一个今文经学家康有为认为,作为形式性宗教的儒家学说的制度化将使中国人的“灵魂”得到最好的维护。古文经学派反对“儒教”的思想,他们坚持认为,学术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播那个先验的“道”,即对一切时代和一切个人都有效的那个绝对价值体系。这个“道”是由古人发现并由圣贤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梁漱溟特别谈到了这个“道统”的传统(真理的延续)。他对康有为并不“尊重”,孔教会也使他“呕吐”①。由于有着贤人的身份,梁漱溟感到,在当今的时代里,他并且只有他充分领会了那个“道”,因此他要负起发扬它的庄严责任:“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②

但是,梁漱溟和其他致力于播扬国粹的人们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他不是任何一个学派的成员。他关于中国的传统经典、注疏、史传方面的知识也远不如章太炎那样的杰出学者。其次,和“五四”以后文化守成主义的主要倾向形成鲜明对照,他并不重视文学遗产和经学。他把对传统文学的学术研究视为精力所用不当而不加考虑,把小说、纯文学、诗歌看作是浪费时光。最后,梁漱溟明确地反对国粹派在保存文化上的努力,他把这些工作说成是“只堆积一些陈旧的古董”和“死板板的烂货”③。

甚至梁漱溟本人也似乎感到了在他的生活及思想中存在着矛盾的困惑,

---

① 〔4〕,p. 137;〔4a〕,p. 4。

② 梁漱溟:“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这是在日军侵入香港、梁漱溟逃到广西梧州以后写给他儿子的信。这封信曾于 1942 年 2 月发表在桂林的报纸上,其中一些内容曾为下列著作摘引:〔197〕,no. 5;〔441〕;〔311〕。

③ 〔4〕,pp. 202,204—206,210—21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也存在着命运的嘲弄。他曾称自己：

> 我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也讲了哲学；
> 我在学校里根本未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家哲学；
> 我未读过大学，结果教了大学；
> 我生于都市，长于都市，而从事于乡村工作。①

假如他进一步想想，还会再加上几条。作为著名的倡导佛教的学者，他指责当代中国佛教的再流行是自私的书呆子们“藉着人心理之弱点而收罗信徒”的坏事②。他毕生都是一个反黩武主义者，却又是 4 名军官的朋友和顾问③。他是一个“反动分子”，却把蒋介石和袁世凯划为同一阶级④，认为国民党过于保守，而 30 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正适合了中国的真正需要。能够作为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亲密朋友，和毛泽东、周恩来保持着私人关系，而与国民党新传统主义的理论家陈立夫仅仅是点头之交，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保守主义者呢？

一个世界范围的保守主义反应

如果我们把梁漱溟作为对“非保守”、“非传统”现象——现代化——的世界性反应的一种，或许能看出梁漱溟的真正意义。我这里的“现代化”一词是在韦伯的“合理化”这一概念的一般含义上使用的。不断发展的对现代化批判的主要倾向，一直是强调纯粹理性主义在解决人类生存条件的所有问题上表现的局限性。这可能是一种所谓认为现代化的万灵药膏上总落着苍蝇的传统意识，或者是对于那个靠无止境的技术救助的“英勇的新世界”的不自在感。这种对现代化的反动已超出了一般的政治范畴，并且它既包括了悲观的保守主义者，也包括了乐观的革命家。因为他们面对共同的“对手”，即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批评家的某种保守派。正如曼海姆（Karl Mannheim）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和生命主义的实在概念都来源于同一种对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反抗⑤。这种虚幻的反现代化的感情从来没有被满意地

---

① 〔564〕，p. 4；又见〔14a〕。

② 〔4〕，pp. 207—209；〔5r〕。

③ 这四名军人有三位属于桂系集团，他们是李宗仁、李济深、陈铭枢。另一位是韩复榘，他最初是冯玉祥的属下。

④ 〔11n〕，p. 351.

⑤ 〔422〕，pp. 161—164。

定义过,尽管一些历史学家一直企图用浪漫主义、反理性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批判现代派以至文学现代派等术语来描述这一感情的种种表现。当西方对于现代化批判的最新表述不再是云山雾罩的时候,专家们或许会再增加一些新词。

无定义大约正是一种确切的定义。个人环境、每一种现代化以前的传统的积极内容以及特殊的历史地位形成了每一个守成主义者的总体反应。不管历史环境和个人关系如何,我仍然认为这里有一些共同的主题。"守成主义者"好像都把传统社会形式作为检验社会是否优越的试金石,因此也就将这种传统的社会形式理想化。他们面对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这一共同敌人(虽然他们自己的政治态度也可以被划归自由一类),都厌恶个人的物质私利。他们怀疑或者直率地敌视工业化的结果,特别是现代化的紧张生活。这种态度强调社会在个人之上,有机的自然共同体在人工的法律关系和个人权利之上。除了强调机构的自然团体以外,这些守成主义者还寻求或渴望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真理。最重要的是,他们过高地估价了人类存在的非理性和非功利的方面。

在现代文明的发源地西欧以外的地区,还可以分辨出这种对现代文明的保守主义反应的第二个相关且有特色的因素。当这些文化单位面对现代文明时,他们就把它想象成"异类",于是就在"历史"和"价值"之间产生了列文森(Joseph Levenson)指出的那种紧张。因此,同中国的体用二分或以后的精神与物质相对的区分相类似的公式也在印度、日本和穆斯林世界这些传统国家中出现过。这些地区受到了西方优越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直接威胁,并且在自卫中他们又被迫借鉴侵略者的文化。这种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有用的外来"物质"之间的区别之形成,可以解释为一种源于自卑感的情绪反应。

在那些正在经历这些转变的非西方社会中,"文化"开始被作为一种重要的新方式加以理解。的确,在资产阶级功利社会的心脏地带,文化观念显示和发生的作用在某些方面也与它在更传统性社会中起的作用相类似。正如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在他关于英语词汇的经典研究中指出的:

> 文化是作为一种抽象的和绝对的东西出现的;在其中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归并到两种反应之上。第一是承认某种道德和智力活动同推动一种新社会的原动力有着实际分离;第二是强调这种活动作为人类上诉的法庭,它凌驾于实际的社会判决之上,并且把它自己作为平抚和重组的替代办法提供出来。①

① 〔577〕,p. xvi.

当然，英国人没有经历一个来自外部的现代化过程。它没有发生认同的危机和不充实感。但 1800 年前后的德国则明显地在经济和政治上落后了。这同英国和法国很好地建立了单一民族国家有关。并且，正是德国人最系统地发展了文化的概念。同正在改变欧洲外观的社会和经济上的合理化相反，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人们的内心感情上。

内部与外观的区别常常被表述为文化和文明的区别[①]。文化是定性的、有机的、规范的、感情的、主观的和特殊的（包括风俗、宗教和艺术），而文明则是定量的、机械的、理智的、积累的和普遍的（包括科学和技术）。精神—物质或精神—自然的观念的区分（这种区分是那样彻底地渗透到了启蒙运动之后德国的思想中）同非西方的保守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们构造的区分是相类似的。相对立于西方的立法主义和理性主义，俄国的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也设计了类似的区分：俄国的村社和精神。他们有时也直接借鉴德国浪漫主义者们的思想。我们还可以看到 19 世纪末在穆斯林兄弟关系中的文化复兴运动也是用的同一方式，例如在萨努西亚（Sanusiya）。在印度、中国和日本，这种与控制自然相对的融合自然或与理智相对的直觉的公式是很常见的。

在所有这些公式的表述中都或隐或显地存在一种主张，它既要求本土精神文化的优越性，又主张为了进步要尽可能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的物质文化。这种东西方优越性相结合的结果既为这些“落后”民族提供了西方掌握自然的设备，又使他们可以保持自己很高的精神性（文化、斯拉夫灵魂，等等）。落后地区反应中的这种分类因素是这些地区集体性认同的危机。“中国（或印度、日本及其他）的精神同西方技术相结合”这种陈腐思想的千万种形式都来源于那种对精神和文化灭绝的恐惧。在现代民族主义的感情或理智的基本反应中，这种陈腐思想常常达到顶点。例如，德国的浪漫主义无法摆脱德国的民族主义和泛德意志主义；泛伊斯兰教运动吸收了穆斯林兄弟关系的精神文化复兴；泛亚洲主义者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甚至像甘地这种人也成了民族主义的领袖。在中国，国粹团体成了国民党新传统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在所有这些地区，文化逐渐被看作是独特的不能复制的精华。在来源上和含义上它有着民族性，并且它与现代化的社会政治现实是相分离的。关心那种以质朴的民族或人民精神为基础的文化复兴的往往是一些知识分

① 内在的精神有时表现为“文明”（如 W. von Humbolt，A. Schaeffle，P. Barth 等人指出的），有时也表现为“文化”（见 A. Weber 的著名公式以及 F. Oppenheimer 等人的论述）。这些有着明显区别的概念以及“*Kultur*”这个综合性的概念都表现了早期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尤其是歌德和席勒的思想）的自然发展。

子。他们与这些运动结合在一起,对语言、历史、文学、民俗学的研究产生了相当浓厚的兴趣。

平均地权论和乡村建设

对现代化的这一世界范围的反应的另一个特点是反都市的平均地权主义。梁漱溟及其在 30 年代从事的乡村建设与这种反应是相符合的。但是,我们将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外部特征和平均地权主义的基本性质加以区别。在战前的 10 年中,中国出现了几百种地方农村的改革方案。大部分方案集中在教育、信贷、灌溉、卫生这类具体问题上。梁漱溟在山东的方案所以著名,在于它们试图解决所有上述问题并实现全部文化的复兴。虽然可以说梁漱溟在 30 年代确实曾作为农村改革的全国性发言人而出现,战争期间又作为准政党——乡建派的领袖,但并非所有的乡村改革家都赞同他哲学上的平均地权论。他的这种理论主张为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社会谋求普遍的优越性。

由于一个工业化国家所带来的战争迫使美国杰出的平均地权论的理论家杰弗逊 (Thomas Jefferson) 不得不部分地放弃所抱的幻想:即一个土地平均的国家并不受"国家的创伤"和工业化城市的损害①。杰弗逊也着意于他所考虑的那种普遍的人类价值,这种人类价值和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分不开的。但是在权衡这种价值与一个国家的生存孰重孰轻时,他又闪烁其辞。当 1931 年日本人入侵满洲、梁漱溟面临平均地权论与国家政权之间同样的冲突时,他又是如何反应的呢?梁漱溟指出了一种适宜中国的榜样:印度及他们对于英帝国主义的非武装的但是团结一致的道德上的抵抗;丹麦,它们不是为改变其畏缩的国际地位而斗争,而是致力于改进其人民的生活水平。当 1937 年全面战争来临时,梁漱溟的答案基本没有改变:精神上的团结 (而不是工业和军事上的强大) 或许能救中国②。

当被迫作出一种选择时,和杰弗逊一样,梁漱溟不能允许国家政权的利益摧毁文化。因为他在根本上是一心维护某种模式的文化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献身于中国政府的国家主义者。中国人的政府也可以是保存这种模式的

① 〔328〕,XI,503—505。杰弗逊在 1816 年给奥斯丁 (Benjiamin Austin) 的信中承认,1812 年的战争使得他放弃了他以前一直坚持并写入他 1784 年《弗吉尼亚笔记》(Notes on Virginia) 中的反都市立场。

② 见〔10〕;〔41〕;〔42n〕。

工具,但它并不以此为其本身的目的。的确,梁漱溟也经常以国家主义者的口气提出他的看法,认为实际上只有通过中国传统的复兴国家才能昌盛。但在他看来,传统不仅包括历史,还有贯串在历史中的意义。它不是用来满足民统大一统和骄傲感的一件历史文物,而是目前行动的基础。和现代化以前的中国人一样,梁漱溟确信中国并非仅仅是诸文化中的一支,而是唯一真正的人类文化。但因为他生活在 20 世纪,这种信念还是来之不易的,是经过了一番精神上的奥德赛才达到的,不能只看作是梁漱溟对他所怀有的那一设想的顽固坚持。

梁漱溟和他父亲的关系

鉴于父子关系对于我这项研究中许多问题的重要性,这部书的一大部分篇幅集中在梁漱溟的父亲梁济身上。由于梁济对其儿子个性发展的影响,也由于他因自己的身份而作为一个引人入胜的人物,我相信对本书的篇幅作这样的处理是有理由的。

从另一角度上说,这种对于父子关系及围绕其四周的特殊环境的周密研究,也会得到关于中国现代史中关键一代形成中的一些因素的发现。梁漱溟是这一批判的一代中的一分子。这一代人横跨那样一段混乱的时期,这段时期从旧帝国制度的最后年代一直延伸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新秩序以后。这一代人在知识界和政界支配着“五四”以及“五四”以后直至今天的中国。像这一代其他人的父亲一样,梁漱溟的父亲安然地生活在那个相对来说尚未因西学的侵入而受影响的传统中国社会里。相反,梁漱溟本人则几乎自 6 岁起就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虽然这种时代冲突和对照的特殊性也许并不典型,但对它的深入考察将揭示出一些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因素,这些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感情的母腹——一代杰出的中国人正是在这个母腹中成熟的。

第一章　父与子

1918 年冬天，北京，一个蓝色的黎明中，梁济从他的书房中走了出来，花白的胡须衬着他的庄严。他在书房中度过了一个孤独的不眠之夜。此刻，他走向附近的净业湖，投身于冰水之中。这一自称是为了垂死的中国传统文化殉难的自杀行为，使这个由忽必烈可汗第五子所开始、其血脉在官方知识界延续了 8 世纪之久的梁氏家族激动人心地结束了①。虽然祖先和家族背景对任何传记研究都有着社会学或心理学的意义，但对于文化危机的中国和这个为文化殉难的家庭来说，它们的意义就更特殊一些。

1893 年 10 月 10 日，在北京紫禁城附近安福胡同的一间小屋里，梁漱溟——这个家族的第二十三代子孙降生了②。两个月以后，在一个没有前辈的显赫、也没有“书香”熏染的农户里，梁漱溟未来的学生、而最终将成为他的导师的毛泽东降生了。胡适——这位梁漱溟未来在北京大学的同事和对手——已经三岁了，正在台湾东部他父亲的衙门里蹒跚行走。

桂林梁氏

自 19 世纪初开始，梁家就一直把桂林城西南远郊当作他们的祖籍，虽然漱溟的祖父乃至曾祖都是在北京而不是在桂林度过他们的大半生的。梁济

① 忽必烈可汗之子名叫和克齐。1281 年，授云南王。元朝灭亡时，这一支归顺了明朝。当时，这一族家居汝阳（今河南息县）。汝阳为战国时魏都大梁所在地，故该族取梁为汉姓。在有明一代，该族一直世袭显爵。清朝建立后，该族迁居江苏江宁。这以后不久，即转由科举取仕。〔99b〕，pp. 1a—b；〔71〕，p. 3。

② 他的名字叫焕鼎。1912 年，同盟会员孙浚明（1927 年春国民党清共时，他在上海被杀害）为他取字“漱溟”，后来他以此名行于世。〔99b〕，p. 12b；〔71〕，pp. 3，39；〔14a〕，p. 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